

弥留之际，心爱的歌《我是一个兵》为他安魂

从放牛娃到“战士作家”，高玉宝传奇谢幕

“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传奇人物，是那个激情燃烧时代的缩影

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成为全国扫盲运动的标志性人物，成了畅销书作家，他的作品风靡一时家喻户晓；他又有名的演说家，从67年前第一场报告开始，半个多世纪走遍大半个中国，作了5000多场报告，听众达数百万人……

本报记者于力、蔡拥军、郭翔

12月5日，大连，天空飘着零星雪花，美且无声，92岁的传奇老兵在《我是一个兵》的旋律中悄然而去。

病床旁，儿子为他唱《我是一个兵》

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……”12月5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七医院1628病房，传出了低沉、时断时续的《我是一个兵》的歌声，高玉宝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双目紧闭。弥留之际，长子高燕飞明白父亲最后的心思，在父亲耳边轻轻地唱起这首他一生最爱的歌曲。

1947年11月，出身贫苦家庭的高玉宝在家乡辽宁瓦房店参军入伍，那一年他刚满20岁。参军不到一年的高玉宝随后就在塔山经历了一生最惨烈、最难忘的战斗——塔山阻击战。在塔山阵地，电话线被炮火炸断，通信员高玉宝冒着炮火跑步传达命令，因作战勇猛，高玉宝在塔山荣立大功。

今年7月，患有重病的高玉宝回忆说：“一生都忘不了那场光明与黑暗的塔山决斗；忘不了那6天6夜的阵地拼杀和血雨腥风；更忘不了那些在阵地上宁死不退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战友们……”

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，高玉宝忍着病痛的折磨，带着从工资积蓄中省吃俭用下来的10万元参加塔山阻击战纪念馆捐赠仪式。在他人的搀扶下，他走上台激动地说：“等我生命终结之后，我也请求回到塔山，回到我们的‘初心’之地，与塔山阻击战牺牲的英烈战友们相伴到永远！我们老战友们将在‘塔山阵地’重新集结，静静等待我们亲爱的祖国日益强盛，我们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那一天！”

从辽沈大地到平津战场，从南下作战到广西剿匪，高玉宝先后荣立大功六次，小功两次。此后高玉宝被组织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，1962年毕业后，他本可以留在北京总部机关工作，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，他向组织请缨到“海防前线”，他说，作为一名战士，前线才是他的哨位。从通信员、警卫员到创作员、沈阳军区创作室荣誉主任，从战士到师职干部，高玉宝的岗位在变、



▲左图：高玉宝在病床上敬军礼。

级别在变，但“兵心”不变。当别人叫他首长时，他摆摆手：“我就是个兵，为战士写作的兵。”在高玉宝10平方米的卧室里，有个老式玻璃柜，占据了整整一面墙，柜里除了一尊毛主席塑像和几本荣誉证书外，满是武器模型，连珍藏的两瓶酒也是炮弹形的。卧室的台灯是高玉宝用迫击炮弹壳改造的，上面用红笔写着“上甘岭留念”。

画出来的入党申请书

记者在高玉宝的家里，看到一张特殊的名片：正面印有战士作家高玉宝的字样，背面上方印有入党申请书五个字，下面是他1948年当战士时画出来的入党申请书的内容。

画只毛毛虫代表“从”、画个心形代表心，画只眼睛代表“眼”……**穷苦出身只认识几个字**的高玉宝用各种图形代替文字画了八个字的入党申请书：“我从心里要入党”。

当时的指导员猜了半天，听完高玉宝的解释后，哈哈大笑：“你这个入党申请书写得好！”

1948年6月，高玉宝光荣入党。从小喜欢听评书的高玉宝编了一首歌谣：“党是妈妈我是娃，叫我干啥就干啥，不折不扣不讲价，永远听我妈妈话。”

因为没有文化，入党申请书只能靠画，因为没文化，高玉宝差点犯了大错。高玉宝任团通信员时，一次团部让他给三个营送文件，文件袋上标注着“壹、贰、叁”，他不认识，因为是深夜了，又不好意思打扰战友询问，硬着头皮抱着侥幸心理就去送。第二天，团首长大发雷霆，斥责高玉宝把文件全送错了，高玉宝哭着低声说：“我不识字。”首长心一软没有处罚高玉宝，**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没有文化干不好革命。”**

以瓦片为纸钉子为笔，写字识字；**拦下骑马首长，学字问字……**军旅作家胡世宗在追忆高玉宝时说：“当时一位军首长骑马下部队，被高玉宝



右图：高玉宝在小学讲革命传统。（图片由高玉宝家人提供）

截住问字，警卫员说首长忙，你这位同志怎么这样……军首长下了马，高兴地说，他问字，爱学习，很好嘛！”事实上，高玉宝当时并不认识军首长，而拦首长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首长文化水平应该高。

在部队进行诉苦教育后，高玉宝想把自己当放牛娃、小长工的经历写出来给弟弟看，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自传体小说《高玉宝》的草稿。1955年，草稿经反复修改后，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其中《**半夜鸡叫**》《**我要读书**》等章节引起**极大轰动**，此后他又陆续创作出了《高玉宝续集》《**春袍**》《**我是一个兵**》等文学作品。

高玉宝大学时的老师评价高玉宝，在同班同学中，他的学习不算突出，主要受他原来基础的限制，他的文化底子比较薄，入学的时候年龄已偏大，但他在学习上还是很努力很投入的。

一句“没有文化干不好革命”**让文盲高玉宝刻苦发奋学习成长成为“战士作家”**，成为全国、全民族扫盲运动的标志性人物。“我是在新中国温暖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，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，就不会有现在的高玉宝，我一辈子都要和祖国同命运，共患难。”高玉宝说。

5000多场报告，他只收红领巾

高玉宝去世后，辽宁警察学院干部赵宏光带来了红色的“大学生德育导师”聘书，要颁发给今年9月到学校参加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高玉宝，“我和高老结识20年，高老讲的革命传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。”

从画出“我从心里要入党”后，高玉宝就用一生的努力去践行自己的承诺。1952年，高玉宝在北京东绒线胡同小学作了第一场革命传统报告，60多年来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先后作报告5000多场。

“20多年前，我们邀请离休的高老到许昌作革命传统报告，他不辞辛苦，深入到许多学校、企事

业单位作报告，鼓舞人心。”河南许昌退休干部金和敏至今对高玉宝作报告的场景历历在目。

多年照顾高玉宝生活起居的次子高燕翔说，晚年由于身体不好，父亲无法作几个小时的报告了，但凡是有老师和学生来到家里，他都热情接待，“在他看来，革命传统教育是他能做的替党分忧、为党尽责的事。”

高玉宝曾不止一次地说：“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讲爱党爱国，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愿意听我讲课，我也要讲党和祖国这一课。”

一些听过高玉宝报告的人说，他讲课生动，常常脱稿讲，即兴讲，尤其是讲到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，讲到自己小时候的苦难生活，常常禁不住掉下眼泪。

只收红领巾，鲜花和聘书是高玉宝60多年来作报告的原则；**不收酬金、不收礼品、不吃请是规矩**。收到红领巾后，他会签上名字，再赠送给学生。在高玉宝卧室的玻璃柜最上的格子里，系着红领巾的毛主席塑像格外醒目，他离世后，子女在他卧室的床头柜上摆上了一个系着红领巾的高玉宝塑像，朝着毛主席塑像凝望。

“红领巾是高老赠予孩子的珍贵礼物。”老战友胡世宗回忆说，高老曾把红领巾赠予我的儿女，后来他来沈阳作报告时还在红领巾上签上赠言赠予我的外孙，并为孩子别上雷锋纪念章。

“我20多年前开始与高爷爷通信，爷爷亲切的话语伴我从小到大，树立起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价值观。”已过而立之年的高萃曾是高玉宝的“笔友”，她说：“爷爷没有刻板的灌输，没有家长式的说教，让我感到老前辈对下一代的良苦用心和殷殷厚望。”

“第一次作革命传统报告时，孩子们叫他高玉宝哥哥，后来变成了高玉宝叔叔，再后来变成了高玉宝爷爷，最后变成了高玉宝老爷爷。”高燕飞说。

他答应过妻子，村里脱贫后外出打工养家……

贵州习水县桃林镇兴隆村，党支部书记马勇的死与生

“马勇生前对村民太好了，从来不会有私心，做什么事情都是为群众考虑，我们一定要来送他最后一程。”得知马勇去世的消息后，马明强和燎原组十多位村民一起，自发前来为他守夜

“我在村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‘有事找马勇’。”熊山说

本报记者郑明鸿

“那是我第一次主持葬礼，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群众争相为逝者守夜。”兴隆村村委会主任周绍伦，对村民们争相为马勇守夜的场景记忆犹新。

马勇是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桃林镇兴隆村党支部书记，2019年10月30日，他因病医治无效，不幸去世，生命定格在45岁。

深山园丁

盼“良书如镜天天照”

马勇是土生土长的兴隆村人。1992年初中毕业后，他向父亲要了盘缠，只身一人到浙江打工。但仅一年，他就回来了。“他跟我说外边的路修得好，家家门口都是马路，书也教得好，要是我们这个地方也能那样就好了。”马勇父亲马昌显回忆说。

“1992年以前，有人在村里租房办了一间小学，但1992年春季学期结束后就停办了。”原桃林

镇教工站站长陆远旭告诉记者，后来，又有人在村里办起了学校，但也只办了一年。

那之后，村里的孩子只能到邻村上学。“每天要走几公里路，对于小孩子来说是很困难的。”陆远旭说，“那时还没有营养午餐，小孩子中午在学校没有饭吃，冬天还有很多孩子受冻。”

回乡后，孩子们的遭遇，马勇看在眼里，忧在心里。“他跟我说他想教书。”马昌显说，马勇的想法得到了周围村民的支持，他们说，村里没有学校，马勇来教书是件好事。

1994年，征得桃林镇教工站同意后，马勇和父亲一起，在家对面的小山头上修了一间简易教室，办起了学校。第一年，他招到40多个学生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加上马勇对教学非常负责，逐渐有邻村的家长将孩子送到马勇的学校上学。“最多时有差不多260名学生。”陆远旭说。

学生越来越多，马勇和父亲修建的简易教室不能满足教学所需，他便租下亲戚家的房子用作教室，随后又动员家人挖土打砖，在自家地里修建四间土坯房。马勇还简单平整了剩余的空地，作为学生课余时间的活动场所。

2001年5月，桃林镇教工站组织全镇学校负责人到马勇的学校开了一次现场会。同年，桃林镇教工站从办公经费中挤出32000元，资助马勇新修学校。

“那时村里还没有通公路，建材运不进去，修学校很困难，但他坚持要干。”陆远旭说，马勇将教工站支持的32000元悉数用于购买钢筋水泥和支付师傅工资，修学校所需的石材则全部是他组织家人和当地村民上山开采的。

公路不通，马勇便和当地村民一起，靠马驮背，把建材运了进来。马昌显记得，那段时间，马勇白天上课，晚上就打着手电背建材。“有一天晚上背水泥的时候，他摔倒在河沟里，小腿被石头割了一条口，手电筒也掉河里了。”马昌显数度哽咽，“他修这间学校是最辛苦的。”

最终，马勇修起了一座两层楼高，拥有六间教

室、一间办公室和一间教休室的教学楼。

“2008年，我们定点招聘了一位老师到新坪小学任教，马勇对这位老师也很好，他想把这位老师留住，好好教当地的孩子。”习水县政府责任区督学朱斗谦说。

在马勇妻子唐中兰的印象中，只要有空，马勇都会到如今已经废弃的教学楼走走。教学楼二楼一间教室的门总是敞开着，那是马勇生前最常去的教室，教室黑板边上用红纸写成的半副对联依旧可见：“良书如镜天天照”。

贫村通路

“他高兴得像个吃到糖的孩子”

因生活所迫，2006年，马勇辞去代课教师，第二次外出务工。但仅8个月，他就告诉妻子想回家了。

唐中兰心中满是不解，她嘀咕着：“难道是因为长期在村里代课，不适应外面的打工生活？”为了弄清缘由，唐中兰找到了和丈夫一起务工的弟弟，“弟弟告诉我他做得很好，刚到没多久就学会了操控机床，老板很喜欢他。”

后来，她才明白，丈夫并非不适应外面的打工生活，而是不愿，见识了外面的繁华后，改变家乡贫穷现状的想法又在马勇内心荡漾。

2007年，回乡后的马勇带着村民开始修路，他们选择了一段不用调整土地、地势还算平缓的地方，开始了第一次修路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和村民一起，用锄头挖出了一公里多的毛路。

“路都不通，怎么致富？”是那时的马勇常说的一句话。

2007年兴隆村村委会换届选举，带着村民修路的马勇当选村委会副主任。2008年，马勇正式上任。

“2007年至2012年修通村路的毛坯路，2012年至2013年修通兴隆村到官店镇三星村的公路，

2013年至2014年完成兴隆村的通组路修建……”周绍伦列出了马勇的修路时间表。

路通了，兴隆村终于冲破了大山的阻隔，但马勇并不满足。“我也问过他，现在兴隆村都四通八达了，你为什么还想修路？”习水县财政局副局长熊山说。

马勇的答复是：“村里挨着桐梓县，要打通到桐梓的通道，否则我们这个地方以后就会成为一个死角，群众怎么发展？”

2017年，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，习水县投入专项资金，对还未硬化的通村路和通组路进行硬化。熊山说：“马勇经常泡在工地上，问他原因，他告诉我，好不容易盼来了硬化路，一定要在工地上看着，确保质量不出半点问题。”

唐中兰回忆，公路硬化完成那天，一向话不多的马勇逢人就打招呼，高兴得像个吃到糖的孩子。

“公路修通了但还没硬化的时候，他的摩托车上随时绑着锄头和铲子，遇到涨水，他都要用铲子和锄头去疏通水流，防止公路被冲坏。”周绍伦回忆。

由死到生

“他的生是永生”

今年马勇成为兴隆村村支书。10月15日，马勇早早出了门。当天，他要和其他村干部一起，去桃林镇参加脱贫“战区”调整动员会和脱贫攻坚业务会。

当天上午，马勇晕倒在会场，同事提议送他去医院检查，被他拒绝了。后来，在同事的陪同下，马勇到桃林镇卫生院做了简单的检查，输了两瓶葡萄糖，便又继续工作了。

回到村里，在哥哥和妻子不停劝说下，马勇答应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据贵州航天医院全科主治医生陈顺明回忆，马勇到医院时的症状

大院里的“磨刀师傅”

“高叔叔磨菜刀可不是‘练摊’，很专业，有一整套工具。”高玉宝的邻居韩爱平说，一般人很难相信名人高玉宝竟然还是磨刀师傅。在高玉宝居住的社区，他磨刀手艺是出了名的，也乐于帮邻居磨刀，以致于儿子高燕飞小时候一听到《红灯记》里“磨剪刀，戥菜刀”的选段时，脑海中就会浮现父亲磨刀的画面。

“磨刀有什么可说的，就是会磨才帮帮大家。”高玉宝80岁时一边磨刀一边对采访他的记者说。在大院里，邻居们时常看到，高玉宝坐在楼前，挽起袖子，用自备质量上乘的砂轮和磨石熟练地打磨刀锋。逢年过节，常常有三四十把刀排队等着他磨。

高玉宝常说：“党给我荣誉，不是叫我去享受，也不是叫我高人一等，而是给我为人民服务的巨大动力，如果有一天，我离开这个世界，不带走半棵草。”

1988年，高玉宝离职休养，住进了干休所，住房90平方米左右。水磨石地面、几十年前老样式的桌椅板凳、用了20多年的红色塑料保温瓶……“这个屋子30年没有变，最新的物件是这两年买的空调，那时父亲身体已经不好，受不了夏季炎热。”高燕飞说，父亲抠门，“家里的洗衣机破得不能用，他舍不得换，还是我偷偷买来一个，趁父亲不在上安装工人把旧洗衣机搬走。”

高玉宝到外地作报告总是尽量坐便宜的交通工具，能省则省，坐船通常都是坐最便宜的通铺。离休后，在大连本地作报告，他骑着一辆上世纪50年代产的斜梁自行车，60多年过去了，他的自行车还放在家中的小仓库里，舍不得扔。

高燕飞回忆说，上世纪80年代，他去码头接从南方回来的父亲。“父亲两个包系在一起，胸前一个、背后一个，搭在肩膀上，和农民一样。我赶忙抢过来拿上，说你好歹是师职干部。父亲则笑着说，一个当兵的，哪那么多讲究！”

高玉宝对自己抠门，却总想着把东西给更需要的人。高玉宝晚年牙口不好，子女给他买来食品粉碎机，他藏起来，子女问他为何不用，他说：“我还能行，我准备送给更需要的老战友。”

高玉宝的孙子高天晨小时候经常被爷爷奶奶带着去邮局汇款，“爷爷说带我去帮助有困难的人。爷爷去世后，我才发现一个小本上密密麻麻的捐款记录。”

2017年8月1日，大连晚报社举办“家乡父老送你上大学”募捐的第二天，工作人员接到高玉宝电话，他说他腿脚不便，你们方不方便来我家一趟，拿一下捐款，我想为孩子们出一份力……不完全统计，高玉宝先后为“希望工程”、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捐款捐物10多万元，赠送图书1万多册。2019年还分别向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和湖南衡山战役烈士墓捐款10万元和15万元。

“不忘初心永葆共产党员本色，牢记使命尽显人民战士风范。”12月7日悼念大厅里高悬的挽联，凝练了高玉宝的传奇人生。高玉宝走了，穿着那套永远不变的绿色军装，他留下了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道德模范、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等近百项荣誉，留下了那段永远抹不掉的红色记忆……